



白族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伯简与《社会进化简史》

□ 解永越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曾将一本名为《社会进化简史》的书籍列为学员的重要课外读物。1943年12月20日，毛泽东为了学习“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的相关内容，致信秘书胡乔木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从中可以看出，即使过了很多年，毛泽东依然对这本《社会进化简史》有深刻印象。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张伯简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他的这本书会一直得到毛泽东的重视？

（一）

这本书的作者张伯简是最早的白族共产党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理论宣传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经历。张伯简是国内较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阐述社会发展进程的杰出代表者，他的《社会进化简史》曾被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视为开启智慧的必读书目。

张伯简1898年出生于云南省，由于目睹了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状况，少年时的张伯简就胸怀救国救民之志。1917年张伯简中学毕业后，由于受全国革命浪潮的影响，本想前往四川参加护国军，但由于各方面原因未能成行。张伯简没有就此放弃心中的理想，他不顾父亲反对，毅然前往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广州。到广州后，张伯简在驻粤滇军中担任军需工作，但安稳的工作并不符合他心中的革命抱负。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了全国各地，其中也包括拥有深厚革命基础的广州。张伯简在《南越游记——稚青日记》中写道：“今晨见报纸所载，风潮甚烈。广东学界又因青岛问题，全体罢课。军政府亦表同情，然皆纸上谈兵，未见实际，殊可叹矣。”正当张伯简忧虑国家的前途命运时，在中国国内出现了勤工俭学的新潮流，张伯简对勤工俭学运动非常认可，他在《勤工俭学变迁略史》中写道：“勤工俭学是应世界潮流而生，为中国数千年文化运动激荡而成，是一种最光明显著的社会运



动。”1919年12月，张伯简以“理财产本非所能”为由，辞去了在滇军中的军需职务，离开广州，开始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旅程。也是从此刻开始，张伯简渐渐地与马克思主义学说“走”到了一起。

在勤工俭学期间，张伯简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并和他们一起交流思想、参与社会实践，这使张伯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勤工俭学时，张伯简既要学习，又要通过做工争取生活费。也正是在劳动和实践中，他认识到工人阶级一直受到不公的对待与剥削，内心开始思考如何建设新的“理想社会”。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张伯简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21年，张伯简在德国柏林加入了共产党。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由于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张伯简被选为组织委员。赵世炎评价他说：“伯简信仰坚，诚实又有见地，且善活动，不过不善言语就是”。1922年张伯简遵从党的委派，前往莫斯科参加会议并学习。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他刻苦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著作，也阅读了诸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著作，经过两年多的系统学习以及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感悟，张伯简成为一名既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研究者，又有丰富实践斗争经验的革命者。

1924年张伯简由莫斯科回国，承担《向导》《中国青年》的编辑发行工作，并于1924年11月前后担任党

中央出版部书记。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张伯简主要负责会场布置和文书保卫等事务工作。之后，张伯简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陈独秀、张大雷一起被指定为“特请列席人”，并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1926年，张伯简与张大雷、邓中夏、苏兆征等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张伯简任罢工委员会书记。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由于日夜操劳，张伯简早年患有的肺病突然恶化，不幸于1926年8月在广州病逝，年仅28岁。

（二）

拥有丰富革命实践经验的张伯简，也将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思考写进了他的代表作《社会进化简史》一书中。《社会进化简史》于1925年在上海、广州印刷出版，共有八个章节和一个附录（《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元素表》）。该书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上，详细介绍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结构、社会类型的进化与演进。如第八章《共产社会》，也是全书正文的最后一个章节，张伯简运用通俗的语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经济、政治、文化等角度为切入点，细致描绘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样貌。他热情地歌颂，“共产社会的分子，并不是因为恐惧和压迫，而是发于良心，自愿奉献其能力及才能，为全社会的幸福而工作，而他亦可以取得一切需要的东西。不过要达到这种境地，必须生产力非常发达，才有可能”。他坚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形态最终会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乃至跃迁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张伯简通过深度思考与搜集资料，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出发，历数社会发展变迁中各种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在书中充分展现出未来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光明前途，并表达了自己作为革命者的坚定信仰和信念。

此外要特别说明的是，《社会进化简史》中的《（附）各时代社会经

济结构元素表》这一章是该书中的点睛之笔，也是集大成者。与前八章相比，该章相对独立，文章体例编排自成一派，文中从生产形式、生产单位、主要动力、革命运动、年代的标记等十九个方面列出各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与特征，清晰地呈现出高级社会形态相比于低级社会形态的优势，为读者勾画出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

（三）

《社会进化简史》是张伯简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记录他革命生涯的最好佐证。张伯简用他的一生诠释着对党的忠诚与信仰。1925年8月，他在《致岳家诸长者》的信中提到：“伯简现在和将来，都要从事民族革命工作，生活早东暮西，实无法顾及家庭。”足见他“舍小家，顾大家”的革命情怀。1945年4月1日，周恩来亲自填写了张伯简烈士的登记表，以此来缅怀他的这位老朋友、老战友。1952年，经毛泽东签发，以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为张伯简烈士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纪念证。证件上用严肃端正的文字写着：“查张伯简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张伯简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张伯简曾在《南越游记——稚青日记》中感叹地说道：“不与贵交，我不贱；不与富交，我不贫。此其非故为简傲，虑为纷华靡丽所伤也。”简单的话语背后勾勒出一位淡泊清高、追求内心理想的年轻革命者形象。在由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张伯简文辑》序言中，曾对张伯简作出过如下评价：张伯简同志是白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是云南少数民族和知识分子成为共产党员的先驱，也是云南青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的优秀党员之一，这在云南少数民族历史上具有“破天荒”的意义和深远的意义。



治灾自古就是安民兴邦的大事，十分考验官员的能力担当。北宋名臣赵抃（1008—1084年）人称“铁面御史”，素以刚正清廉著称。然而，赵抃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治灾能臣。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夏天，两浙路（今浙江省和江苏省南部）遭遇罕见的旱灾，同时蝗灾、瘟疫接连暴发，据史料记载，当时仅两浙西路受灾死难人数就多达50余万，灾情异常严峻。大灾之际，身为越州（今浙江绍兴）知州的赵抃临危不乱，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救济灾民，最大程度地减轻了灾害损失。曾巩在《越州赵公救灾记》中称赞赵抃：“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赵抃的治灾事迹留给后人诸多启迪。

见微知著 谋定而动

早在两浙灾情初露端倪、越州境内尚未出现饥荒之时，赵抃就敏锐地觉察到了灾情风险，开始积极备灾。备灾从何入手？赵抃抓住“粮食”这个要害，谋定“七问”，寻找治理之策。七问，即赵抃询问越州各县官吏的七个问题：哪些乡出现了旱情，能够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的百姓有多少，应从官仓领取救济粮的百姓有多少，可供受灾百姓修建的工程有多少，赈济百姓的官库粮食有多少，富人能够捐出的粮食有多少，可以募集到的僧、道、士的余粮有多少？“七问”看似琐碎平常，实则非常关键，是灾情相关情况的总体梳理。赵抃以“七问”谋篇，掌握了救灾的现有条件，并初步明晰了救灾方向。由此，各县迅速统计出孤老病弱等无力自救的百姓有21900多人，紧急募集粮食达48000多石，大大超过官仓每年按例发给贫困百姓的救济粮3000石，及时缓解了粮食危机，给救灾开了一个好局。

对灾情的“见微知著”连同务实的“七问”，充分显示出赵抃敏锐的风险感知力和果断的行动力。

运筹有力 细致周全

赵抃救灾大处着眼、细处着手、从容有序，正如曾巩所评价：“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

面对复杂灾情，赵抃综合运用赈粮、平糶、工赈、居养、防治流民等手段，稳定了动荡的形势。在实施中，对于丧失自救能力的百姓直接发放救济粮，以解当下燃眉之急。在赈粮的同时又兼顾流民防治，尽力把灾民留在了辖区内，减少百姓因灾离散。对于尚有自救能力的百姓采用平糶法，赵抃从官仓筹集粮食52000余石，开设18处售粮点，以低价售粮给灾民。在此基础上，赵抃又采用以工代赈法，大量招募灾民兴修城防设施，既给工钱又给粮食。与此同时，开设专门的“病坊”，安排专人照料救治病患，使患者得医、死者得葬，遏制了瘟疫传播。

赵抃十分重视救灾细节，尤其在赈粮这个关键举措上，可谓实之又实、细之又细，力戒赈粮易流于形式的弊病。赵抃严格控制发粮数量。他规定，成年灾民每天只给粮一升，年幼者给半升，以满足灾民基本生存所需，以确保救济粮能可持续地、最大范围地惠及灾民。在赈粮秩序和效率上，赵抃也费尽心思。他将救济粮按性别错开日期发放，使救济粮有序送到百姓手中，避免了恐慌。他采用分赈法，把赈粮点设置在灾民最多、离灾民最近的城郊，分布多达57处，以便就近及时领取；他还担心人手不足，专门把赋闲的本地官吏都召集起来参与赈粮。这一系列细致入微的安排，使得越州赈粮很快见到了效果。

古代遭遇灾荒，在粮食供应上多易发生困穷现象，这是救灾的一大难题。闭籴，也称闭粜，即灾年或粮食短缺之时，粮商富户甚至官府停售粮食，囤积居奇的行为。闭籴不售的后果十分严重。苏轼在《奏浙西灾伤第一状》中愤慨地讲道：“熙宁之灾伤，本缘天旱米贵，而沈起、张颢之流，不先事奏闻，但务立赏闭籴，富民皆争藏谷，小民无所得食。”这次大灾中，两浙路的一些州县简单粗暴地闭籴不售，导致了市面上粮食奇缺，断绝了灾民自救之路，造成大

北宋名臣赵抃的治灾之道

□ 卢冀峰



量饥民流散，引起社会严重动荡。

针对闭籴，赵抃巧妙地化危为机。一方面，他明令禁止闭籴不售的不法行为。另一方面，他出奇招调动粮商的售粮积极性。在其他州县普遍抑制粮价、粮商售粮积极性低落之时，赵抃反其道而行之，大胆放开粮价，一时间越州粮价猛涨，各地粮商因趋利而纷纷至沓来，进而越州粮食又大大供过于求，于是粮价应声而跌，越州百姓遂以低价买到了救命粮，灾情得到缓解。赵抃的这一做法在元代《言行龟鉴》、清代《宋稗类钞》等均有类似记载：“……公独令有米者任增价糴之……民无饥死者。”这与当时整个“两浙旱蝗……饿死者十五六”的危急形势，形成了强烈对比。

勤勉担当 民得依归

越州救灾中，赵抃对百姓的生死极为重视，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敬重和拥戴。曾巩赞叹道：“公所拊循，民尤以为得其依归。”

救灾十分考验临场处置能力，既要坚守原则，又要因地制宜。宋代法令规定，发粮赈灾的期限仅三个月，到期就应停止。然而，赵抃立足灾情实际，赈粮达五个月。不仅如此，救灾中逢遇紧急事态，赵抃多果断便宜行事，而对于不能按常规执行的决策，他都一一揽责，以免拖累下属，因此越州官员都积极响应，并跟随他全力救灾。为了汇集众智，赵抃还向百姓广开言路，“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只要是有利于救灾的建议，赵抃就加以肯定，认真采纳推行，唯恐不尽全力。

救灾中，赵抃“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巨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此时的赵抃已年近七旬，已是人生迟暮之年，出任越州知州原本为告老还乡之举，然而在大灾之际，赵抃依然恪守本责、躬身而为、勤勉不息，这份精神实属难能可贵，令人赞叹。

赵抃的治灾事迹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赵抃身后，苏轼为其作《赵清献公神道碑》，感叹道：“公尽所以救荒之术……故越人虽饥而不怨。”碑文满含虔心敬意之情，盛赞了赵抃的越州治灾功绩。



文亩书田 纸传千年

□ 沈晓筱

纸称“文亩”，可供笔耕；亦为“书田”，可成书籍。曾被古人冠以“文亩”之名的纸，是文字及艺术的重要载体，被誉为“文房四宝”之一。千百年来，纸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了记录、保存、传承、传播文化的作用，也在与人的互动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极具辨识度的中华文化符号。

在纸诞生之前，汉字主要采取镌刻、铸造、书写等方式保存在甲骨、青铜器、石、竹简、木牍、缣帛等材质之上，金石取材不易、简牍笨重、缣帛昂贵，这些早期书写材料的不便之处显而易见。追溯造纸术的起源，虽然民间普遍认为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但与蔡伦同时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已有“纸”字：“纸，絮一苦也。”说明当时已有纸的概念。此外，根据甘肃敦煌悬泉置等考古遗址出土的西汉古纸实物，可以推测纸在西汉已经产生，但可能质地较为粗糙，不便书写，直至蔡伦改进造纸术，才真正有了适宜书写的“蔡侯纸”。北魏郦道元游历名山大川，写就地理名著《水经注》，其中专门记载了天水西北的蔡伦故宅，并提及蔡伦“捣故鱼网为纸，用代简素，自其始也”。可见蔡伦造纸故事在后世的流传广泛。魏晋时期，纸日益普及，东晋《桓玄伪事》载：“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纸由此已经全面取代了简帛，成为主要书写材料。

随着造纸术的不断发展，纸的产

地、品类日益增多，而造纸的材料与工艺也大多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施艺，因此产生了诸多名品。宋代苏易简《文房四谱》中记载了黔、歙的名纸“凝霜、澄心”、蜀中的麻纸“玉屑、屑屑”、蜀人的十色笺、江南的侧理纸、王羲之作《兰亭序》所用蚕茧纸等，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中有“历代名纸”篇，其中梳理了历史上的各地名纸，罗列了包括竹纸、楮皮纸、桑皮纸、麻纸、藤角纸、苔纸等在内的50余种，但仍未能尽述。

纸兼具很多功能，如用于加工包装、伞具等生活用具，但最重要的功能还是作为书写的载体，以文本的形式发挥作用。而诸如宣纸等类独特纸品的出现，也使中国传统的书法、绘画艺术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毛笔也在诞生了几百年后终于等到了它的“最佳搭档”。书画家们充分利用毛笔宣纸的特点，在纸张上呈现出“枯湿浓淡”“墨韵万变”的丰富艺术效果。正如郭沫若的评价：“宣纸是中国劳动人民所发明的艺术创造，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离了它，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

在中国古人眼里，纸不只是书写的工具，也深为他们所敬惜和钟爱，是朋友、是宝物。《颜氏家训》中提到“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米芾《寄薛郎中绍彭》中有“玉麟柴几铺云肪”，称纸为“云肪”；陆游《村居日饮酒对梅花醉则拥纸煮熟睡自适也》中“一寒仍

赖猪先生”则将纸亲切地称为“猪先生”；苏轼《和入求笔迹》中“麦光铺几净无眠”中的“麦光”也是一款名纸……这些情感深厚、意味深长的表达也充分体现出人们对纸的情致和诗意。

古代还流传有不少珍视纸张的文人雅事。南唐后主李煜御制精品澄心堂纸，引得众多文人争相追捧。北宋欧阳修得到好友刘原父所赠澄心堂纸，便作《和刘原父澄心纸》称“君家虽有澄心纸，有敢下笔知谁哉”，其品质与珍稀程度让欧阳修也忍不住感慨“谁敢在上面下笔书写呢”？欧阳修随后与好友梅尧臣分享了澄心堂纸，梅尧臣也由此作诗《永叔寄澄心堂纸二幅》：“君今转遣重增愧，无君笔札无君才。心烦收拾乏楮材，日畏播裂防婴孩。不忍挥毫徒有思，依依还起子山哀。”大诗人梅尧臣同样不忍下笔，只能小心收藏防止损坏。后来苏轼亦得知此事，在收到友人宋肇赠送的澄心堂纸后赋诗《次韵宋肇惠澄心纸二首》中也提及此事并称：“古纸无多更分我，自应给札奏新书。”澄心堂纸通过这些古代名家的文人轶事和诗作名闻天下，并为后世津津乐道。

从文明传承的角度来看，纸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者。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约公元4世纪开始外传至周边邻国，后又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继续外传到西亚、欧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巨大

